

公共的政治哲学

任剑涛 著

政治哲学研究丛书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公共的政治哲学

任剑涛 著

政治哲学研究丛书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的政治哲学/任剑涛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政治哲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12160-6

I. ①公… II. ①任… III. ①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026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共理论研究”
(项目号 04BZZ037)的结项成果

政治哲学研究丛书

公共的政治哲学

任剑涛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2160-6

2016年6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6¼

定价: 80.00 元

“政治哲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编 任剑涛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拼音排序）

陈宜中 高全喜 刘 擎

任剑涛 周保松

总 序

任剑涛

政治哲学业已成为汉语学术界的热门论题。

但究竟什么是政治哲学，则是一个莫衷一是的问题。

国学大师章太炎，曾撰有一篇题曰《原儒》的文章。他尝试对同样莫衷一是的“儒”的含义进行界定。他将“儒”的含义区分为三种：一是基于中国文明意义的“达”名之“儒”，这是最宽泛意义上的“儒”。二是在中国传统制度意义上的“类”名之“儒”，这也是一种广义的儒家。凡“知礼乐射御书数”者，可归入此类。三是作为先秦诸家之一的“私”名之“儒”，这是诸子百家中之一家的狭义之“儒”，特点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

章太炎界定儒家的方式具有方法论价值，可以将之用来界定“什么是政治哲学”。如果对“政治哲学”作最宽泛的解释，一切追问政治根柢的学问，都可以归入其中。举凡从神学的角度解释政治问题的学说、从诗学的角度理解政治生活的言说、从文学的视角对政治进行的观察、从政治生活特定角度作出的一般申论，都可以纳入政治哲学范畴。相对确定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是那些围绕政治生活方式如何可以实现美好生活、提升政治生活品质、改善政治组织方式的理论探究。这样的政治哲学探究，理论界限不是那么

清晰，研究目标也不怎么一致，表述方式就更是多种多样。在特定意义上所指的“政治哲学”，则是现代社会诞生之时，萌生的一种特定的部门哲学理论。它的研究形式自具特点，主要是以理性的进路切入政治世界，提要钩玄，将政治基本价值、政治基本制度和主流生活模式刻画出来，并展开不同立论之间、进路之间的竞争性言说，从而凸显一系列供人们斟酌、选择的政治理念。这样的政治哲学研究，旨在“人为自己立法”，因此不再执着于神与人的关系，重在探究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人与人的政治关系。其展开的具体研究活动，不在诗意浪漫的言说中申论，也不在青灯古卷的故纸堆中缕述，而在政治基本价值、基本制度安排与主流生活模式的适宜选择中立论。

显然，汉语学术界的政治哲学研究，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或狭义的政治哲学研究。尤其是善于制造学术研究热点的汉语政治哲学推手们，主要从事的是达名意义的政治哲学研究。他们从政治神学、政治诗学、政治文学、政治古典学等视角，拉开了政治哲学的研究大幕。这样的研究，扩展了汉语学术界关于政治思考的视野，功莫大焉。但是，达名、类名意义的政治哲学研究，已经掩盖了私名意义上的，也就是明确的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研究光辉。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之所以说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学术研究态势，是因为本该成为主流的现代政治哲学研究，被淹没在拒斥现代的政治神学、批判现代的政治诗学等自称的政治哲学著述狂潮中。国人似乎认定，政治哲学就是否定现代的那些个学术样式。一些政治哲学的论者强调指出，政治哲学就是批判考察西方政治哲学，就是深入梳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这样诱导人们远离现代政治生活的政治哲学研究意欲，很难帮助人们真正探入身处其中的现代政治生活。其研究结果极易引导人们认定，现代政治生活乃是一场误会的产物。因此，拒斥现代政治生活，似乎就具有了天经地义的理由。不是说现代政治生活

模式没有缺陷，更不是说只能对之采取辩护的立场，但一味否定现代的导向，恐怕是不利于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处境，并寻求超越现代的进路。

以达名、类名的政治哲学替代私名的政治哲学，是今天中国政治哲学界的一种瞩目现象。这样的研究态势，是中国踏入现代以后，几乎所有专门学术研究的一种基本态势。批判的学术研究替代主流的学术研究，并僭越到主流位置，这是现代汉语学术界的一个反常现象。这自然跟汉语现代学术的晚起、后进有关，也与汉语学术界不愿跟强势的主流话语强硬对话的决断有关。这是一个悲剧。这不仅让中国学术界无法跟世界主流学术界对话，无法对之作出推进性的贡献，而且也无力提供给中国社会融入现代世界的观念力量，让中国既徘徊在现代学术主流的大门外，也局促于非主流学术的伪批判情景中。

有人会说上述言辞有点危言耸听。笔者自然会因此对上述言辞保持一种克制的态度。换言之，政治哲学无须为中国进入不了世界主流承担直接责任。无论怎么说，政治哲学最多只能为中国尚未进入世界主流承担非常间接的责任。因此，中国是不是进入了现代主流世界，不是一个判断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如何的恰当理由。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需要确立自己的适宜进路。就此而言，达名、类名的政治哲学研究，也就有了充分的支持理由。只不过，私名的政治哲学研究，不能因此丧失其值得研究的根据。而且从人们研究政治哲学的经验性品格来讲，帮助政治哲学的关注者理解现代主流的政治生活，也许是一个有力推动私名的政治哲学研究的切实理由。自然这也不构成拒斥那些基于先验、规范或乌托邦理由的政治哲学研究的托词。

政治哲学研究需要继续在神与人、现实与理想的维度上展开其十分丰富的理论蕴含。伪托政治哲学之名的政治神学研究，不管是宗教意义上的政治神学，还是世俗意义上的仿宗教性的政治神学，

那种意图为政治生活托定神圣价值的研究意图，不会丧失其研究的动力。同样，自承是超越滞重的政治现实、寻求政治诗意浪漫本质的政治诗学表达，也具有它强大的言说依托。因为，从单纯理性视角提供的政治哲学论证，总有些单调乏味，未能充分展示政治生活的多姿多彩，尤其是无法提供给人们以充分想象的政治空间。而这恰恰是政治诗学最为擅长的领域。

现代主流的政治哲学，断代在民族国家兴起之际。上帝之国、世界社会与民族国家的划界，是这一理论形式浮现而出的直接动力。它依托于自由、平等、博爱等基本价值，依赖于民主（共和）、法治等基本制度安排，依靠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权力与权利等相关机制的互动体系。这在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中都缺乏深入、系统的描述与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哲学的玄谈性质，一直令人瞩目。政治神学与政治诗学强化了这一定势。这是需要改变的状态。

而且，除开现代的理性政治哲学，政治神学与政治诗学也无法予以正面阐释。这正是需要私名的政治哲学适时出场的强大理由。在这里，申述神人之间的政治神学，只能作为背景论述存在；而阐述现代缺陷的政治诗学，也只能作为理想意欲的表达。它们都无法替代直接描述与解释现代政治生活的理性政治哲学。后者具有自我陈述、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的相对自足性。

这是一种旨在描述与说明人类现代政治处境的、特定的政治哲学理论形式。它不避神学问题，但将之作为背景文化处理；它不拒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省思，但与之视为上下文脉络。它集中处理的论题，是现代何以构成为“现代”。现代的基本价值与制度是如何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状态，是其言说的核心主题。在这里，现代诸意识形态及其竞争性关系，当然是回避不了的论题。但诸意识形态只有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才有一个相互理解、相关诠释的参照系。在这种确定性关系结构中，现代政治哲学的相对确定边界也就凸显出来。不过，这样的研究，不只是为了现代国家提供正当化证

明，超越的意欲，同时潜含其中。只是这样的超越，不见得必然是政治神学、政治诗学这类选项，也不见得是以回归传统作为出路。

在汉语学术界，围绕“现代”处境申述的政治哲学言说，远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在中国步履急骤的现代发展进程中，这样的学术研究，切中现实需要。适应这一需要展开的政治哲学研究，自然不是顺从现实甚至屈从现实的理论活动；相反，旨在帮助人们理解中国现代转变的政治哲学研究，恰恰是在古今中西之间展开的理性活动。它的意义，也就在理顺现实问题、超越现实欲求、逼近政治理想的尝试中浮现出来。

或许，这正是现代政治哲学研究者应予担负的研究责任？！

目 录

导论 公共的政治哲学：理论导向、实践品格与问题域 / 1

- 一、公共的政治哲学：边际划界 / 2
- 二、当代公共生活的三次转变 / 9
- 三、公共的政治哲学重建 / 16
- 四、实践品格 / 24
- 五、问题域 / 31

第一章 关于公共的三种政治哲学 / 40

- 一、自由主义的公私划界 / 41
- 二、共和主义的公共情结 / 54
- 三、新左派理论的公共定位 / 65
- 四、三种公共政治哲学的辩难 / 76
- 五、关于公共的底线共识 / 88

第二章 公共、公共性与私人、私密性 / 97

- 一、公共与公共性 / 98
- 二、私人与私密性 / 113
- 三、公共化与私密化 / 124

四、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均势 / 138

第三章 古典公共与现代公共 / 150

一、雅典与罗马：族群的公共 / 151

二、现代西方：阶级与集团的公共 / 169

三、公共特质的凸显：当代共享的公共 / 186

四、公共建构的历史蜕变：现代与古典的不可逆 / 202

第四章 公权、私权与政治、非政治公共领域 / 217

一、公权与政治公共领域 / 218

二、私权与非政治公共领域 / 234

三、国家、市场与社会：私权的公共维护与公权的私人限制 / 259

第五章 公共理性、公共舆论与公意凸显 / 279

一、理性的公共运用 / 280

二、公共舆论的创制 / 297

三、公共理性和公共舆论中的公意 / 314

四、“公共人”何为？ / 331

第六章 信仰、理性与公共精神 / 347

一、信仰、神学与公共的正当化基础 / 348

二、理性是否足以将公共正当化？ / 364

三、谁能创制并捍卫公共：在上帝、哲学王与民主选民之间 / 385

第七章 国家、公民与公共的政治机制 / 413

一、国家公权与公共的宪制基础 / 414

二、承认的政治与国家公共的完备性取向 / 431

三、国家与公民对公共的相互限定 / 454

第八章 自发的公共与建构的公共 / 478

一、自发秩序、革命社会与公共问题 / 479

二、公共实践及其绵延：公民、公共生活与公共德性 / 501

三、公共的扩展性建构：以民主捍卫公共 / 527

参考文献 / 549

后记 / 560

导论 公共的政治哲学：理论导向、 实践品格与问题域

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公共”命名的学科已经相当繁多。^①但是，“公共”在古今之维、中西之间和理论实践关联上如何得到恰当的定位与解释，还是一个有待清理的复杂问题。无疑，关于“公共”的理论论证是极其重要的事宜：一方面这关系到人类为何聚集成政治社会的理由问题，就此影响到政治社会成员对政治体（如国家）的认同问题，进而影响人类社会的基本政治秩序；另一方面则关系到人类对自身构成状态的改善问题，就此制约人类的政治行动，深刻影响人类的经济、社会、文化与教育等活动方式；再一方面还关系到人类社会如何有效处理社会政治事务的问题，就此牵涉到芜杂的公共事务的处置原则，全面影响人们对待人际关系的方式方法。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关于“公共”的理论探究既是一个相伴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始终的问题，又是一个必须因应不同公共问题建构的理论结构，更是一个关乎人类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秩序的决定性问题。

本书以西方经验为背景，以西方公共政治哲学的论辩为讨论对象，将“公共”生活的不同界面与“公共”理论结构的不同构成作

① 人们所熟知的就有公共经济学、公共财政学、公共预算、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公共组织、公共哲学，等等。这些学科都共享一个定语“public”，但“public”后面跟随的中心词所构成的合成词却具有相当不同的含义。这正是需要对“public”进行深入清理的词源与学理必要的体现。

为审视公共理论的前提,从社会科学不同学科关注的“公共”问题着手,递进到一般哲学理论论述的“公共”问题,落定在政治哲学聚焦的“公共”主题上面,对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展示的理论导向、实践品格和问题域进行总揽性的宏观分析。

一、公共的政治哲学:边际划界

试图界定清楚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边界,就需要对那些以“公共”命名的学科加以学术清理,以便为公共政治哲学划定理论界限,将其必须处理的核心理论问题凸显出来。勾画公共政治哲学的边际界限,需要区分与其相关的两个理论类型的差异:一是与以公共命名的社会科学的差异,二是与一般公共哲学的差异。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在诸多以“公共”命名的现代社会科学中,可以区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最为流行的、紧贴政府运行理论需要的类型,另一个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批判现实状态和国际分工体系不平等关系的理论类型。就前者而言,目前最为流行的是公共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前者涵盖了公共财政、公共预算、税收问题等,后者包括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公共组织等。^① 这些学科之

① 这些学科的热门,不仅可以从不断出版的翻译读物和介绍作品上看起来,还可以从相关论述获得的社会反响上得到认识,更可以从大学学科设置及其社会感召力上获得明证。但这些学科的内涵及其所指似乎有些含混,如公共经济学在中国学术界就被翻译为政府经济学,而公共行政学则被刻意翻译为公共管理学。由此可见人们对“公共”究竟应当如何限定某些学科的认识仍待清理。参见〔美〕约瑟夫·斯蒂格利兹:《政府经济学》,曾强等译,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此书原名为 *Economics of the Public Sector*,中文书名译法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追求明白晓畅而已,因为这一翻译似乎把政府天经地义视为“公共”的,但政府实际上是有自己“私利”的。无独有偶,在我们引进公共管理学科时,也刻意将公共行政省略,只突出公共“管理”的含义。如〔美〕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彭和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原书名为 *Public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An Introduction*,这一翻译似乎刻意将人们熟知的公共行政内涵省略掉,仅仅将人们关注的公共“管理”含义突出出来,似乎政府结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政府的责任就是运用管理科学理念和方法从事公共领域的管理工作而已。这就同前者一样,翻译者似乎有意无意地预设了一个政府自足性与向善性的前提。

间所研究的理论问题相互交叉，但论述进路基本上显现出共同的理论品格，那就是将“公共的”目的性置于所论述的问题之上，作为处理这些理论问题的基本价值导向。这类关于“公共”的学术论题之所以较为集中地呈现出来并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大致是因为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普通民众脱贫背后的公共问题得以凸显出来。就现代经济学聚精会神处理的经济增长问题来讲，经济发展自身的公共目标与经济学自身的公共性问题相互映照，将公共经济学的理论价值鲜明地显示给人们；就经济发展连带显现出的社会政治问题来看，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增长与政府体制的不匹配，导致行政问题的日益凸显，相应引发人们对于公共行政问题的集中关注，这促成了人们对公共行政学或范围更为广泛的公共管理学问题的理论兴趣。可见，人们对于公共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兴致，大致为同样的理论动力所促成。

但不论是申述经济学的公共目的，还是张扬公共经济学的精神，都不能替代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研究。就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公共目的的申述来看，他们对经济学仅仅关注增长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具有警惕性，认定经济学对于物的关注超过了对于人的关注，从而引发环境污染、畸形消费、产能过剩等问题。因此宣称必须以“信念的解放”促使人们关注“公众的利益”这一公共目标。^①这是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发展丧失公共性提出的警告。但他们并没有深入论述公众利益的公共性含义，更没有在政治哲学的高度梳理经济学如何处理公共问题。再就公共经济学来看，虽然它处理的理论问题是实际影响公共生活状态的问题，诸如卫生、国防、教育、社会保障、福利计划、税收等，但基本上是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视角进行分析，并没有意图去深入解释政府为什么必须以公共的价值去对待

① 参见〔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经济学与公共目标》，蔡受白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9页以下。

和处理相关问题的理由。^①这就与政治哲学致力探寻政府的公共本性相去甚远。只有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努力解释社会个体在政治决策机制下的行为选择,并将之运用到政治立宪的解释上面去,但其解释路径是循着征税权、财政制度和投票规则等实证思路前行的,因此对现代立宪民主制度具有的公共性所作的规范解释的贡献仍然不足。^②

就后者即批评经济发展导致的不平等现实和国际分工体系不平等政经关系的公共性论述而言,^③构成关于公共的论述之另一个界面。这一论述可以划归关于公共和公共性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范畴。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快速、长期发展,国家实力的迅速提升,公民平等地享受发展成果成为日益重要的公共事务。但政治体的成员能否实际上平等地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则成为问题,这正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发展公共性的立场进行阐释的依据。与此同时,一个迅速发展的国家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发生着改变,但既定分工体系及其政治限定还在惯性发挥作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欠发展国家在国际大家庭中的不平等历史记忆便开始发酵。基于公共性价值,对当代国际经济分工体系的不平等关系的严重关切,吁求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呼声就会愈来愈强烈。^④这样的国家处境,促使人们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公共性问题。由于这种公共性论述建立在对国际社会存在的严重政治经济不平等关系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因此与当代批判理论的

① 参见〔美〕约瑟夫·斯蒂格里兹:《政府经济学》,著者序言,以及第一章“混合经济下的政府作用”,曾强等译,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参见曾军平:《公共选择与政治立宪》,第一章“导论”,尤其是该章第2节和第6节,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③ 关于“公共性”问题的论述进路,可以认为是对“公共”论述的扩展性处理。公共显示的是公共性的实质内涵,而公共性则是关于公共的形式性特征。这是康德在“什么是启蒙?”和“论永久和平”两文中的区分。

④ 参见汪晖等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汪晖所撰“导论”,该文第一部分切入公共性问题的理由就是典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路。

关系较为紧密。但关于公共性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关于公共的政治哲学的论述进路具有明显区别：前者关注的是在公共性映照下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因此具有鲜明的批判现实风格；后者关注的则是公共理念下政治体建构的基本准则。批判性与建设性的不同取向将其区分为两种理论范式，而且前者的实证性特征与后者的规范性特征也恰成对照。

就第二方面而言，即就一般公共哲学与公共政治哲学的理论差异来看，构成划分公共政治哲学边际界限需要重视的第二个问题。近期欧美国家公共哲学的发展引人瞩目。按照论者的阐述，公共哲学具有自身的理论延续性。它由美国著名学者李普曼最先倡导，之后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贝拉、沙利文等人的促进下获得发展，近期则有从社群主义者转变为共和主义者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桑德尔的理论建构。^① 公共哲学的建构者表现出一些共同特点：一是对当下道德与社会状况的忧心如焚。李普曼即以西方国家的衰落为论述公共哲学复兴的前提，^② 贝拉则对个人主义导致的公众普遍拒斥公共生活的弊端无比担忧，^③ 桑德尔更是明确指责公共领域悬置宗教与道

-
- ① 参见日本学者山胁直司：“关于‘公共哲学’的一些问题”，载王中江主编：《新哲学》（第六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5页。李普曼撰写了《公共哲学》（*The Public Philosoph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55）；贝拉等人编著了《心灵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中译本将书名改为《美国透视——个人主义的困境》，张来举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桑德尔近期出版了《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Democracy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中译本由曾纪茂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公共哲学：政治中的德性论集》（*Public Philosophy: Essays on Morality in Polit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桑德尔的公共哲学与前两人的学科归属具有差异，当他表达自己对公众拒斥公共生活的担忧时，他属于公共哲学的理论阵营；当他从基本政治理念到政治制度透视公共问题时，他谈论的则是公共的政治哲学问题。这表明，在关注公共问题的主题上面，有时公共哲学与公共政治哲学的相似胜于它们之间的差别。
- ② 李普曼的《公共哲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总标题就是“The Decline of the West”；第二部分在真正讨论公共哲学。但从该书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My Reason for Writing This Book”就更可以看出他撰写这部著作的缘由。
- ③ 参见〔美〕罗伯特·贝拉等：《美国透视——个人主义的困境》（张来举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四部分第九章“个人主义”。作者在该书第181页指出：“于是，我们就进入一条死胡同。现代个人主义似乎正在提出一种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看都是不可行的生活方式。”